

古代学术思潮

从《战国策》看战国时期社会风气与思想倾向

翟江月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战国策》中的思想极其复杂,被称作“畔经离道之书”。《战国策》暴露出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一面——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仁义廉耻等儒家通常所谓的美德,跟很多战国策士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是,也正是在这样宽松自由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想与意识由百家争鸣渐渐向儒家的标准合拢,价值观由多元化向一元化靠拢。儒家的价值观正在悄然地受到尊重。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意识基础。

[关键词]《战国策》;物质利益;儒家准则;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08)01-0069-04

On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Trai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Zhai Jianguo

Abstract: *Zhanguocce* manifests complicated thoughts, and many of them were against Confucianism. So, it is considered a book full of unwarranted viewpoints. The figures in *Zhanguocce* showed their innermost feelings and instincts to seek the biggest possible material advantages, and they held different values in comparison with such principles as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sense of honour etc. normally cherished by Confucianism. None the less, due to such free and open circumstances, in the fields of thinking and ideology, the thoughts of various schools drew close to that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nd a variety of values became more and more unified. Values in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took shape step by step, and gained more and more respect. We can assume that Emperor Han - Wu - Di's suppress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in order to advocate Confucianism, was by no means an instantaneous decision, but was deeply - seated in the then social background and firmly backed by the basis of the thoughts of that time.

Key words: *Zhanguocce*; material advantages; Confucian standards; values

经刘向整理、曾巩补正的《战国策》是记述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军事、外交等活动以及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重要典籍,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各诸侯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是司马迁修《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重要史料来源。《战国策》在叙事

事件、刻画人物方面的成就,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国策》不是一人一时所作。书中所记许多人与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可以断定其中大部分是战国时人所著。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战国策》还包含秦末楚汉之际以及部分出自西汉人之手的作品。正因如此,《战国策》一书中包含的

[收稿日期] 2007-11-26

[作者简介]翟江月(1970-),女,山东大学中文系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教授。主要从事中西哲学、国学研究及比较文化研究等,翻译出版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重要典籍多部,独立承担今译、英译工作。

思想、观念也极其复杂,明代李梦阳甚至把它称作“畔经离道之书”^[1]。这里,我们试图根据《战国策》的记述归结战国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意识领域的特色。

一、宽松自由的时代背景

“录往者迹其实,考世者证其变”^[2],后世的人们可以通过《战国策》一书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战国策》展现了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由于不受儒家正统观念的控制,没有“仁”、“义”、“礼”、“忠”、“信”等规范的束缚,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

首先,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对男女关系的随便和对违背男女之大防的男女的宽容,这是对儒家命脉——“礼”的无视。孟尝君的门客与自己的夫人有染,孟尝君似乎毫无夺妻之恨,不但没有将门客处死,反而为他开脱——爱上美貌的女人是人之常情。更有甚者,孟尝君居然资助情敌一大笔盘缠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好朋友卫国君主,并帮他在卫国谋得了高官(《齐策三·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齐襄王即位之前曾有过一段逃亡生活,在此期间与太史敫的女儿私通,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齐策六·齐闵王之遇杀》)。那时候,君王的妃嫔们不但不用藏在深宫,而且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陪同君主共船而钓(《魏策四·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有意思的是,秦宣太后与魏丑夫私通,宣太后临死的时候居然要求自己的情人魏丑夫殉葬,幸亏庸芮晓之以理,才保住了魏丑夫的生命(《秦策二·秦宣太后爱魏丑夫》)。更有甚者,作为一国之母,宣太后不仅不恪守妇道,居然毫无礼义廉耻地对韩国大使尚靳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脾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在儒教盛行的时期,恐怕是难以见到的(《韩策二·楚国雍氏五月》)。

其次,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人才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策士们朝秦暮楚,在各国间穿梭,在他们心目中,完全没有祖国的概念,更没有忠君爱国的意识,儒家所谓的“忠”、“义”与“信”,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他们名义上为各自当时的君主效力,实则为自己的私利奔波。即便身居高位,掌握各国命运的权臣也不例外。例如,张仪作为秦国的重臣,为了一己私利,却找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把汉中之地送还给楚国,正如甘茂所言:“地大者,国

多忧乎!天下有变,王割汉中以为和楚,楚必畔天下而与王。王今以汉中与楚,即天下有变,王何以市楚也?”(《秦策一·张仪欲以汉中与楚》)张仪心怀鬼胎,居心叵测,根本不以国家利益为重。

另外,战国时代诸侯纷争,但是各个诸侯国似乎没有强烈的独立主权意识,因而国与国之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互相干预内政、外交。齐王将把薛地分封给田婴。楚王听说后大怒,准备攻打齐国。齐王想放弃分封,公孙闲劝说楚王促成此事,因为齐国把土地分封给大臣,国家实力就会削弱,不会对楚国构成威胁,甚至在关键时刻会依附楚国,这样一来反而有利于楚国掌控齐国。楚王认为很有道理,就促成分封(《齐策一·齐将封田婴于薛》)。策士们权时度势,利用外交控制别国,与敌国、甚至盟国抗衡,各国之间互相牵制,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为风气。

还有,人们不仅看淡男女之大防,心中没有国家概念,甚至有时还看轻王位。《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记载:“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秦孝公之所以作出这样大胆的决定,可能真的是被商鞅治国安邦的才能所折服,但是能够摒弃宗族观念,抛开亲生的儿子,把王位传给自己亲信的大臣,这样的胸怀和魄力,应该不是一般奉儒教为正统的国君所具备的。

二、追逐私利的风气与价值观的多元化

也正因没有儒家观念的桎梏,人们得以展示比较真实的自我。《战国策》中的人物敞开心扉,把自己最原始、最本能的一面暴露给了读者。而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在《战国策》中,从国家到权臣,再到普通小人物都赤裸裸地追求各自的私利。

第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扩展疆域,掠夺财宝,占有象征最高权力的重器——如九鼎。在这种情势下,国与国之间结成暂时的联盟也是为了争取眼前利益,设置骗局,愚弄盟国,背信弃义。《秦策四·楚魏战于陁山》记载,楚国与魏国在陁山交战,为了防止秦国援助楚国,魏国许诺把上洛送给秦国。魏国在南阳大败楚国后却拒绝送给秦国土地。秦国向魏国讨要,魏国不肯兑现承诺。管浅为秦王出谋划策,让秦王扬言与楚王会晤,以要挟魏国。魏国果然乖乖地献出土地。魏国出尔反尔,见风使舵,相机行

事,用空头支票争取别国支持。管浅足智多谋,审时度势,逼迫魏国履行诺言。再如,《魏策一·徐州之役》记载,徐州战役中,公孙衍建议魏王表面帮助齐国,暗中结交楚国,从而煽风点火,怂恿齐国和楚国交战,而实际上坐山观虎斗,如果齐国取胜,就联合它一起夺取楚国方城以北的土地;如果楚国战胜,就联合它一同控制齐国。可见各国之间满腹阴谋,毫无信义可言。

第二,各国的重臣根本不以本国利益为重,各怀鬼胎,千方百计巩固自己的利益。《秦策一·张仪欲假秦兵以救魏》中,张仪想派秦兵援救魏国,甘茂不同意。左成建议甘茂同意张仪发兵救援,理由是:如果秦兵伤亡过重,不能返回秦国,张仪势必也不敢回秦国了;如果秦兵得胜回国,魏国一定重用张仪,他也不敢回秦国了。总而言之,两种结果对甘茂都有利,因为假如张仪不离开秦国,他的职位就始终高居甘茂之上。左成的建议完全是维护甘茂的私利,全然不顾秦兵的死活和秦国的大计。又如,张仪打算同时执掌秦国、魏国的相印,史厌劝说赵献促成张仪获得魏国相位,这样一来,韩国担心会被消灭,必定向南投靠楚国。结果张仪兼相秦国、魏国,赵献自己也可以并相楚国与韩国了(《魏策一·张仪欲并相秦魏》)。再如,赵国权臣大成午特意赶到韩国与申不害合谋互相串通,共同把持韩国与赵国的大权(《韩策一·大成午从赵来》)。两人各怀鬼胎,各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不难看出,对于执掌大权的重臣来说,他们不但没有忠君意识,完全不以“事二主”为意,而且把自己的权位看得远比其所服务国家的利益重要得多。

第三,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也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苏秦游说秦王没有成功的时候回到家里,风尘仆仆,一贫如洗,“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等到他游说赵王得到赏识后,飞黄腾达,出使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秦军进攻邯郸,十七个月都没有攻下。人们纷纷建议指挥攻城的将军王稽犒赏将士,王稽不听,结果将士们诬告王稽造反(《秦策三·秦攻邯郸》)。甘茂率军进攻宜阳,三次击鼓士卒都不冲锋上阵。右将劝说甘茂犒赏将士,甘茂拿出自己的钱进行赏赐,第二天,一举攻克宜阳(《秦策二·甘茂攻宜阳》)。

由此可见金钱的作用——前线将士可以在金钱的刺激下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所以苏秦感叹:“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人活在世上,怎能够不追求权势与富贵呢?

由上可见,战国人是赤裸裸地追求物质利益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追名逐利的时代。与物质的追求相结合,在意识领域,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价值观的矛盾与多元化。战国人楼缓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公甫文伯在鲁国为官病死后,他的十六个女人都自杀殉葬,但是公甫文伯的母亲知道这个噩耗后却没有掉一滴眼泪。别人问他母亲为什么,她说这说明他生前对妻妾胜过对自己的母亲。楼缓认为,用一个母亲的标准来衡量,她是个好母亲,但另一方面却说明她是个善妒的女人(《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标准原自人心,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相同。苏代对燕昭王说的一段话,大概代表了战国时代很多人的心声:“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鳅,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

仁义廉耻等儒家通常所谓的美德,跟很多战国策士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奉行的是截然相反的准则。《魏策二·史举非犀首于王》记载史举跟公孙衍有矛盾,史举在魏惠王面前说公孙衍的坏话。公孙衍为排挤打击史举,对张仪说:“请令王让先生以国,王为尧、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许由也。衍请因令王致万户邑于先生。”张仪很高兴,于是多次命令史举去见公孙衍,魏惠王听了就不再信任史举,史举只好不辞而去。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涉及的几个人物奉行的原则和标准都十分简单,在他们看来,凡是让出王位的君主,都具备尧、舜一样的德行;凡是推辞王位的人臣,品格都可以跟许由媲美。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就很可笑了。不难看出,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不择手段,动用各种阴谋诡计,迫害异己,为眼前利益,临时结党,坑害国家,中饱私囊,根本没有是非准绳和固定的价值标准。

三、价值观渐趋向儒家标准靠拢

但是,也正是在这样宽松自由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想与意识由百家争鸣渐渐向儒家的标准

合拢,价值观由多元化向一元化靠拢。一个突出的标志是,战国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层——“士”。《战国策》记录了“士”阶层的崛起。关于崛起的背景,这里我们不作深入讨论,我们只是大致对“士人”进行归类:一是“勇士”,如聂政、豫让、荆轲等等,这类人为了报答别人——通常是比自己的身份、地位都高出甚多的社会上层人士的知遇之恩,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为“知己”行刺仇家。《战国策》对于他们持肯定的态度。二是“策士”,如蔡泽、顿弱、苏秦、苏代、张仪、姚贾,他们巧舌如簧,洞彻时势,分析问题,切中要害,凭借高超的辩论技巧,控制对方的思路与心智,令人欲罢不能。所谓的“工文者模其辞”就是指这类人。但是他们游说诸侯,往往主要还是为自己获取利益。对于这类人,《战国策》作者基本上持中立态度,只是客观记录了他们的言行智谋。三是“义士”,如冯谖为孟尝君“市义”,唐雎不辱使命,鲁仲连义不救秦等等,这些士人品行高尚,智勇双全,成为后世人们的楷模,实际上,他们是儒家价值观的身体力行者。我们不难推断出《战国策》对于他们的赞赏态度。

也就是说,《战国策》一书的思想虽然杂乱,但是符合儒家标准的价值观正在逐渐形成,或者说逐渐受到尊重。例如,太史敦对于自己的女儿与法章——后来的齐襄王私通生下儿子,做这样的评价:“女无谋而嫁者,非吾种也,污吾世矣。”终身不见这个外孙。太史这样对待女儿和私生的外孙,显然是儒家正统的态度。同一章中,也对太史的女儿进行褒扬——“君王后贤,不以不睹之故,失人子之礼也”赞美女儿对父亲尽孝心,显然也是符合儒家“孝”的标准(《齐策六·齐闵王之遇杀》)。《魏策一·文侯与虞人期猎》记载魏文侯信守承诺,冒着大雨践行与守林人一起打猎的约会。“魏于是乎始强”一语,表明诚信是立国之本,也体现了《战国策》作者对于“信”的态度。《魏策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记载鲁国君主告诫魏王警惕美酒、美食、美色、美景的诱惑,勤于朝政。鲁国实属儒家之正统,鲁君一席话,体现了鲁国儒家的价值观。故事结尾“梁王称善”,《战国策》作者对于儒家执政理念的认同自在不言中。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战国时代,儒家的价

值观正在悄然地受到尊重。与当时社会上追逐私利的风气相比较,儒家克己复礼、弘扬大义的观念的确代表着一种更为正义、无私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人的认同,也影响了同时代的义士的价值判断与人生选择。而义士的模范作用又在更大范围影响了更多的人。因此,结合《战国策》的成书年代,当有一部分完成于汉初来推测,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偶然的一时之举,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意识基础的。在战国时代的多种价值取向中,儒家观念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无疑为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打下了基础。

但是,儒家思想毕竟不是战国策思想的主流,战国这个追名逐利的时代,容忍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追逐私利,结果是,人们为了追逐最大利益,往往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而他们最常用的就是阴谋诡计。李梦阳所谓的“好谋者袭其智”^[3],就是这个意思。例如,昌他从西周逃往东周,把西周的情况都透露给了东周。东周十分高兴,西周大怒。冯且派人携带三十斤黄金和一封送给昌他的信,信上写着:“告诉昌他,事情能够成功,就尽力去做;不能成功,就赶紧回来。事情拖得久了就会泄露,那你就会丧命。”然后派人告诉东周的侦查人员今夜有奸细入境,侦查人员抓到冯切派来栽赃陷害昌他的人献给东周君主,东周立即把昌他杀掉了(《东周策·昌他亡西周》)。不仅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场战争,可以采取卑鄙的欺骗手段,甚至还有人谋划篡夺整个国家,如吕不韦企图篡夺秦国,李园阴谋夺取楚国,千方百计让自己妹妹与春申君的私生子继承楚国王位等等。他们手段的阴险,令人发指。从这个意义上,《战国策》也给一些阴谋小人提供了反面的教材。对于《战国策》与其中记述的人与事,我们需要持客观公允的态度,这样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战国时期思想意识领域的现实。

[参考文献]

[1][2][3] 韩峥嵘,王锡荣. 战国策译注[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13.

(责任编辑:陈青荣)